《漢學研究通訊》 0253-2875 第 41 卷第 4 期 頁 23-27

紀念專號

# 跟張老師在香港科大念書（附錄：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紀要）

# Learning with Professor Chang Hao at HKUST (Appendix: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in Honor of the Academic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Chang Hao)

范廣欣（Fan Guangxin）*

張老師過世頭七那天，他的一些學生、後輩和友人舉行了一個追思會。當時我用「君子之交淡如水」來描述我們師生的交往，意思是說我們在一起總是談學術，我們以精神的生命而非世俗的生命彼此交流，關係簡單、純淨，不涉及任何利益交換。我將發言整理出來，發給我大學時代的朋友。他們很羨慕我遇到這樣的好老師。有人說，師生關係關鍵在老師。這當然是對的。有人說，張老師有古代君子之風。這一點，不太準確。

張老師是當代的君子，他的古文修養很好，出口成章，但是塑造他待人接物之風格的，恐怕不是中國的古典，而是自由主義的信念。在他身邊，我深深感到他是一個真正的、低調的自由主義者。作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不僅珍視自己的自由，也尊重別人的自主，在師生關係中便表現為從不將自己的意思強加於人，從不干預我的獨立思考，不管是學術或者其他方面。作為低調的自由主義者，他很少在我面前提起他的政治立場，我甚至沒有聽過他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儘管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記憶中我們師生從來沒有談過政治的話題，他關心中國的前途，相信自由民主最可以保障普通人的權益，我當然是知道的，他文章裡有寫，上課或者平時談話偶爾也會自然流露，但他從來不曾利用老師的權威向我灌輸，哪怕剛剛相識的時候我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初到香港科技大學，很快決定選張老師做導師，不是因為仰慕老師的學問或名聲，而是因為跟老師在一起談話，如沐春風，完全感覺不到壓力。那是 1998 年，我剛剛從南京大學本科畢業，被國家教委（即後來的中國教育部）選派到香港科技大學讀研究生。初到香港，一切都是新鮮的，興奮之餘，總是覺得被人另眼相看。當時人文學部一下子錄取了八名由國家教委選派的中國大陸學生，老師們擔心我們看不慣助教辦公室本來訂的《明報》和《蘋果日報》（後者是一份以低俗和反共而知名的報紙）。一位負責的老師表示，打算為我們改訂一份香港左派的報紙。報紙後來沒換，因為大家都說原來的報紙挺好，不用換了。另一位老師，每次我去辦公室找他談讀書的事，總會跟我講諸如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領袖、列寧的殘暴和魯迅對愛國的反思這一類的話題。無論是負責老師的體貼，還是那位老師的教化，我心存感激，卻有點彆扭。其實，年青而優秀的大學畢業生，不管來自哪裡，都一樣期待自己擁有開放的心靈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香港的環境裡可以自由地獲取各式各樣新的資訊，在此基礎上運用理性做

* 作者現為南開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出屬於自己的判斷。然而，張老師對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完全是一視同仁，我第一次到辦公室找張老師，立刻就被他鼓勵的微笑所吸引，他的微笑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我現在一閉眼睛還能看到。在老師眼中，學生好學是最重要的，他從哪裡來，沒那麼重要。老師對我這樣的年輕研究生總是鼓勵和引導，從不過度保護或灌輸自己的想法。

張老師給我上課，指導我寫碩士論文、寫博士論文，前後接近七年。其間我無數次去辦公室找張老師談學問。老師從一開始就當我是年輕的學者，我們每次的談話，不像是過去理解的傳道、授業，而更像是學者之間就共同感興趣的論題做定期交流。老師一步步引我走上思想史研究的路，他是那麼好的學者，但是他總是願意傾聽我的想法，考慮我的興趣，從不把他的意見強加於我，另一方面卻總是在關鍵的時候給我關鍵的點撥。

碩士論文選題的時候，張老師瞭解到我對國際關係史有興趣，於是建議我研究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外交思想，同時提醒我外交思想和政治思想分不開，從後者切入才能獲得深刻的見解。為了追求深刻的見解，我的碩士論文處理了郭嵩燾的傳統學術與其政治及外交思想的關係，得出的結論是他出使之前的學術著作已經奠定其政治及外交思想的框架。這個結論得到老師的讚賞，他給其他學生講課，還專門提到我的觀點。

受到鼓舞，我在博士階段決定繼續研究郭嵩燾所屬的學術共同體（即晚清湖南理學家）如何通過傳統學術為重建政治秩序發掘資源。寫作博士論文期間，我每一章寫好都會交給老師，再約時間跟他面談。老師的批語總是非常簡單，見面的時候，他給我一些建議和問題，總是以鼓勵為主，幫我拓展思路，從不為難我。整篇博士論文幾十萬字，老師鄭重要我修改的只有標題和簡介。標題的事情，因為我自有想法，老師為了說服我，跟我做了多番討論。我本來想用「通經致用」概括晚清湖南理學家的學問，張老師說不好，一來因為這個說法漢學意味太重，二來「致用」含義比較模糊，可以是經世之用，也可以是修身之用，而論文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湖南理學家的學術如何為經世致用提供了資源。老師的第二個理由終於說服了我。為了準確表達論文的主題，我在魏源的文字中找到了「以經術為治術」這個說法，用來替代「通經致用」，還遵循老師的意見，將副標題改為「晚清湖南理學家的經世觀念研究」。後來，為張老師籌劃榮退座談會的時候，我才知道老師認為自己的主要研究興趣之一，就是「經世傳統與儒家政治思想」。通過「經世」這個含義豐富的概念，我的論文便和張老師長期關心的問題連繫在一起，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大傳統聯繫在一起。這就是關鍵的點撥。

除了少數關鍵時刻，老師總是任由我自己思考，自由寫作，享受探索的樂趣，而不加干涉。但是我知道他在那裡，在辦公室，在電話那邊，我可以通過定期的交談，向老師報告我最新的發現以及遭遇的困難，並且聽老師跟我分享他作為出類拔萃的前輩學者所獨具的洞見，從中汲取營養以繼續前行。現在他不在了，但在我心中，他沒有真的離去。他的書還在我的書架上，我翻開書，還是能看到他的文字，還是能聽到他的聲音。

也許有人會問：這樣的師生關係是不是一種現代的工作關係（working relationship）？你們師生之間是不是不夠親密？張老師是不是一個特別西化的人？我想不是。有一件小事我很少跟別人提及，讀書的時候，有一次約了老師在他辦公室見面談學問。到了約定的時間，老師還沒來，這種情況比較罕見，他通常是守時的。站在他辦公室門口等了一陣子，我便離開去樓下的助教辦

作者與張灝老師（左）於 Reston 住宅客廳合影

公室，打算過一會兒再上樓看看。不久，助教辦公室的電話突然響了，是張老師打過來。他說你現在上來。原來老師生氣了，一臉不悅，反覆說：「你就是不願意等我。」這句話說得我特別委屈，當時心態上還是一個大孩子，忍不住一邊解釋一邊失聲痛哭。老師最後接受了我的解釋，原諒了我。這件事就過去了，在我們的關係中一點痕跡也沒留下來，只是我偶爾會想起老師的話。為什麼他有這樣的判斷？是不是我平時就有失禮之處而不自知，老師看在眼裡，卻因為喜歡我這個學生，所以不跟我計較？

我現在的理解是：儘管談學問時完全平等待人，張老師對學生其實還是有要求的，而且是中國式的要求。儘管他經常包容我的疏忽，他心裡還是認為學生要尊重老師，要懂禮數。另一方面，有禮亦有情，他將師生關係看作是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既離不開自由的思想交流，也離不開真情流露。因為有禮數的要求，所以我當時應該在門外一直等他，不應該擅自離開。因為親密，所以他才會跟我發脾氣，而不用隱忍或掩飾，而且事情過去了，便不再放在心上。也是因為親密，我才會像孩子一樣為老師一句話就哭出聲來。

張老師是當代的君子，從我們師生的交往中，我看到的是一個真誠而低調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平等待人、尊重自由思考的前輩學者，一個寬容而真情的老師。

作者與張灝老師伉儷（右）於 Reston 住宅區湖邊合影

2005 年初我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張老師也決定退休回美國定居。他走之前，我為他籌辦一個活動。我問張老師他有什麼期望。老師原先不知道我的籌畫，所以既驚訝又高興。他說，不要興師動眾，找些老朋友、老學生談談學問就好了。於是定下來在 4 月 30 日辦一個小規模的榮退學術座談會，出席者來自兩岸三地，都是張老師點名要見的故人。老師覺得美國的友人來一次不容易，所以就沒有請他們。座談會圍繞四個主題，包括轉型時代、經世傳統與儒家政治思想、革命的思想道路、幽暗意識，這些都是張老師最關心的學術議題，顯然他是希望對自己一生的學問做比較系統的回顧。每個主題均有一至兩位引言人，張老師還就轉型時代和革命的思想道路闡述自己最新的見解。那天的討論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延續到晚飯時間。張老師興致很高，神采奕奕。晚飯的時候，他才告訴我們 4 月 30 日正是他的生日。

## 附錄：「轉型時代與革命的思想道路：張灝教授榮退學術座談會」紀要

2005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為張灝教授舉行榮退學術座談會，校外特邀嘉賓包括：王汎森、丘為君、古鴻廷、李歐梵、金觀濤、高承恕、梁元生、陳方正、陳俊啟、許紀霖、張隆溪、劉青峰。鄭樹森署理院長首先致辭，期望張教授退而不休。

座談會分上、下兩場。上場討論轉型時代、經世傳統與儒家政治思想，由李歐梵主持。他指出張教授的學問有如下特點：一、對任何中國的問題都採取比較文化的立場；二、注意問題的兩歧性，強調不同面向的對比和對話；三、不是只就某一個問題做深入探討，而是像交響樂一樣，圍繞主旋律，不同的主題交換變奏。王汎森為轉型時代引言，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轉型有兩次，首先是軸心時代，然後是 1895 年至 1925 年的近代轉型。張教授對近代轉型的研究同時反映了他對時代命運和個

人認同的思考。陳榮開為後一個主題引言，指出張教授深信，不瞭解歷史傳統便不足以瞭解當前時代，他對幽暗意識與超越意識的發掘，為我們考察傳統思想提供了不同於新儒家的另一角度。

張教授就近代轉型做如下補充：提出這一觀念是對學術界兩個普遍看法的回應。第一是五四本位，相信一切從五四開始。實際上五四的三大主題：民主、科學和反傳統，在 1895 年以後都已經浮現。五四思想是對當時時代危機的回應，因此要瞭解五四思想，至少要認識當時的危機，包括政治危機和文化危機兩個方面，而我們要瞭解這一政治和文化危機的來龍去脈，也必須從 1895 年開始。第二是認為近現代思想文化的轉型可以上溯到 18 世紀，乃至明末清初，其代表人物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張教授認為明末清初的思想變遷不足以稱為轉型。所謂轉型的必要條件是該精神傳統的核心部分受到很大的震盪而解體或解紐。明末清初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傳統，其核心是一個二元組合，由一套以天人合一為代表的宇宙觀和另一套價值觀組合起來。後者又有兩面，一面是以仁為代表、以內聖外王為基本模式的德性倫理，另一面是以禮為代表、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外範倫理。這套核心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外範倫理，不限於儒家，還深入中國精神傳統的另外兩支即道和佛。因此可以說，上述二元組合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結構；在晚明儘管受到衝擊震盪，卻不至於解體解紐。當時由耶穌會傳入的西學妥協性強，並不挑戰儒家基本的價值觀和宇宙觀。明末清初的新宇宙觀氣一元論的興起和散佈，帶來一定程度的道德解放，有影響，有震盪，卻沒有真正衝擊核心思想。從經世觀念出發展開的批判意識，以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為代表，總的來說也沒有撼動核心。當時士大夫也開始組織學會，這種自由結社、參與政治的趨勢卻並未充分發展。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的新發展在 17、18 世紀以後逐漸式微、淡化、消退，所以明清之際也好，18 世紀也好，思想的核心並未轉型。

1895 年之前沒有真正的轉型，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就廣度而言，西學的散布始終有很大限制，因為科舉制度還主導著中國教育，西學沒有進入主流學校系統；就深度而言，傳統的核心價值並未受到解體性震盪，中體西用的意義就在這裡。直到 1895 年，西學才進入中國的教育和考試制度，並且與新型文化媒體結合起來，造成文化取向的危機。除了危機，1895 年以後也出現許多新生事物、新詞彙和新的話語。長久以來人們認為這種新話語、新論述就是民族主義，實際上內容要廣泛得多。中國開始進入意識形態的時代，直到今天。有幾個特徵值得一提：一、意識形態的出現是對當時文化危機的回應，1895 年以後傳統精神資源相形見絀，中國人面對新世界不知所從，需要新的認知藍圖和價值指標。二、「群」的觀念凸顯，在中國傳統中只有先秦的荀子和晚唐的柳宗元談這個觀念，1895 年以後重新受到重視，大致反映當時人認為傳統政治秩序正在崩潰，需要重談「群」，重談如何建構新的政治、社會秩序。當時各種意識形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就是針對如何重組中國政治秩序這一基本問題。三、新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二元組合，包括新價值系統和與其配合的新宇宙觀，比如自由主義討論群體生命和個人生命面對新世界應該做什麼，背後就有一套宇宙觀作支撐。當時最流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後面也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四、新價值系統本身是一個三層結構，意識形態指出當前的困境和危機，也提出因應之道，包括未來的理想目標和從現狀到目標的道路。

自由問答時間，張教授還就軸心時代和近代轉型的特徵發表意見，指出轉型並不代表與傳統完全決裂，西學的作用不僅在於把新的元素注入中國文化，而且在於對傳統中隱性、潛在的因素發生催化作用，使其彰顯適應時代的要求。

下場討論革命的思想道路和幽暗意識，由陳方正主持。陳建華和許紀霖分別為革命的思想道路引言。前者指出張教授許多宏觀和微觀的研究都是在對整個中國革命的關照之下進行，他治思想史不僅注重觀念，還注重制度建構，並且能發掘文學資料印證思想的線索。後者指出張教授對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均採取內觀的視角，從當事人的感受出發；探討革命的起源尤其重視發掘對立衝突的各家各派共同的思想預設。接下來張隆溪為幽暗意識引言。他說幽暗意識源自基督教的原罪觀

念，與英式的民主傳統有很深的關係，認為人不可能在地上建立烏托邦，而在中國傳統裡不是主流，沒有得到充分發展。

作為回應，張教授分析自 1895 年開始在中國的革命的意義大概可以分成三類：一、小革命，以傳統儒家天命觀為出發點，強調唯有德者能王，承認顛覆暴政、改朝換代的合理性；二、中革命，即政治革命，不僅改變政權，而且要變化政治體制，辛亥革命推翻殷商以來的普世王權，就是這一性質；三、最值得重視的是大革命，首先也是政治革命，掌握權力以後還要扭轉乾坤，即運用政治手段全面改造過去的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方方面面，其中蘊含著啟蒙運動以來的轉化意識。張教授最關心的是大革命如何在中國發展出來，因為影響中國最大的是大革命。以上三重革命的意義 1895 年以後一開始就出現，但是有比重的不同，總的趨勢是不斷激化，一直到 1976 年。從 1895 年到 1911 年，主要是小革命，由小革命向中革命出發，大革命也出現了，但是處於思想的邊緣，比如譚嗣同的《仁學》就是要沖決整個傳統的網羅，但是影響不大。從 1911 年到五四後期，是從中革命向大革命轉化，五四後期大革命的觀念已佔主導地位，知識分子大幅度左轉，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鋪路。簡言之，中國的革命觀念一開始就非常複雜，從發展的趨勢看，大革命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中國共產黨對於大革命的觀念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激化的過程。1935 年到 1945 年是第一個階段，可以稱為隱型的激化。當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雖然表面上思想溫和，但已埋下激化的種子。一方面，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發展為政治宗教。所謂政治宗教，指本來的理想主義後面有一種絕對精神滲入進來，變成絕對的信念，不可避免潛在狂熱和激情，等待機會湧現。另一方面，毛澤東既然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他的巨大身影便籠罩全黨，他的革命觀念便起支配作用。重要的不僅是他的思想，還有他的性格——歷史走到緊要關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具有籠罩性影響的領袖之思想和性格——一是湖南人的特性，所謂「不信邪」，倔強而堅信主觀意志力；二是具有詩人的豐富想像力和藝術創造力，喜歡鋌而走險，把政治美學化。有詩為證：「無限風光在險峰」。1955 年開始進入第二個階段，毛澤東號召進行第二次革命，這是一場永遠的革命、不斷的革命。在此以前革命被認為是關鍵性的手段和方法，進入共產主義便毋須革命。現在毛卻認為即使共產社會仍有矛盾，仍需革命，革命便成為唯一可靠的魔棒和人類得救的最後希望。也可以說在毛的思想裏，靜態的烏托邦已變成動態的烏托邦。

後來張教授又藉答問的機會闡發他對幽暗意識的看法：強調幽暗意識並不是否定希望，人的生命徘徊在神性和魔性、希望和絕望之間。不管如何幽暗，他個人還是相信軸心時代所揭示的人之普世價值和共同理想，所以一方面是幽暗，另一方面理想也不能放棄，兩者必須持平。

20 世紀的主要教訓是中國人的理想主義過於高調，因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退休以後，打算繼續研究革命的思想道路，就是想做一些反思的工作：理想過高，危險得很，殷鑒不遠，就在文革。人與禽獸最大的不同在於，禽獸只生活在當前的環境之中，人則不可避免地有理想和現實兩面，所以如果要瞭解人，便不可忽略理想。問題是怎樣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國人就是因為沒有持平，所以在 20 世紀闖下大禍。

四個小時很快過去，與會者紛紛祝願張教授在榮退以後生活美滿，並且繼續關心思想史的大問題。